

李学勤 主编

中国学术史



(上) 【宋元卷】

朱汉民 等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B2
L305
5.1

李学勤
主编

中国学术史

宋元卷
(上)

朱汉民等/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2639

总 序

研究中国学术史,写出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想法,在我的心中酝酿,可说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一设想的萌芽,还是从我多年从事的先秦历史、考古方面研究开始的。记得在“文革”终结后不久的1981年,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我作了一个题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言^①,其中一节就叫做《学术史与古代文明》。

当时我提到“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有数几大远古文明之一,久已蜚声于世。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当时文明的辉煌绚丽,却没有人能够否认”。特别是考古学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耳目一新。然后尽管如此,长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很不够的,“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我们觉得,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因此,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遥远的古代,却不能不同时将眼光注视到后世甚至是现代的学术史。

这一点对我的业务工作来说,很重要。我反复考虑,逐渐明白了学术和历史的关系。学术,不论是其整体,还是各个分科,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有着兴起、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认识学术,必须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评价学术,也不能离开历史的情况与条件。这样说,当然不是把一切学术都作为意识形态来看待,只是说明学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同时又难免受到整个历史的影响和限制。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

在这里需要说一说什么是学术。80年代有过什么是文

① 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载《人文杂志》专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

化的热烈讨论,那时我曾戏仿禅语说:文化这个词,不讲人人明白,越讲越不明白。学术这个词,或许也是这样。不过在近些年,国内有一种趋势,说学术似乎一定不包括自然科学,学术与科学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这在字面上、内涵上都是不合适的,用在现代以前的学术上尤其不妥当。有学者主张,科学和技术应该区别开来^①,这样讲的科学更应算在学术以内。我们讲的学术史,用现代分科来说,包括文科、理科等的历史。

几年前有一场学术与思想的争论。一些论著提出,学术有别于思想,学者不同于思想家,甚至在论文的分类上都有学术与思想两途。揣想这种看法的起源,是要强调理论性、根本性问题的重,但强将学术、思想划分开来,是不合实际的。我有一次提到,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专门以思潮相标举。至于后来的思想史著作,核心是哲学史,便不是涵盖全面的学术史了。

真正的学术大家,没有不具有深刻而系统的思想的。历史上的学者,有些于当世文化知识无不通习,如中国的朱子、英国的培根,固不用说;现今的学者,也多在专门的学科之上有其高瞻远瞩的思想观点,连自然科学家也不例外,有谁能说爱因斯坦、斯蒂芬·霍金等不能称为思想家呢?

人类的知识本来是整体的,学术在任何历史时期也是整体,只是由于具体个人的能力有限,难以窥其大全,才根据知识的结构分立为若干学科。也正因为如此,不同学科有许多交叉搭界、无法割裂之处,而新的学科每每即于学科间的边缘创造出来。全面地、整体地研究学术史,能够更好地看到学科间的关系,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学科学者间的关系。在多学科交叉已成为学术进步趋势的今天,我们的研究更必须注意这一点。

① 吴大猷:《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西方的原因》,载《易学与科学》1997年第1期。

大家知道,学科的精细分化主要是近代的现象,所以研究古代的学术史,特别有必要从整体出发。现在探讨古代学术的作品,一般是以现今的学科作为出发点。例如今天有力学,就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寻找与现代力学有关的观念和发明,从而构成了中国力学史。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足以揭示古今学科的关联,并对古代的成就作出估价,然而古代何尝有力学这一学科?有关材料只能由种种文献爬梳辑集,其在当时学术中的位置如何,与当时学术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何,很难从今天力学的范畴来说明。

由此可见,学术史研究不仅需要是全面的、整体的,还应该是历史的。我们应当按照历史上学术的本来面貌去观察。十年以前,在纪念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 90 诞辰的研讨会上,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炳郁教授曾就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讲过这样的意见。我觉得,他的见解对整个学术史都是适用的。

中国有研究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前文提到的梁启超的两部书,可说是现代意义的学术史专著的开始。另外,章太炎的不少论著,其实也有同样的贡献。至于历史上学术史性质的作品,追溯起来可以早到晚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钟锋先生的《中国传统学术史》^①,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学术史史。他所论及的历代学术史性质著作,上起《庄子》的《天下》篇,下迄徐世昌所纂《清儒学案》,有五十多种之多。分析这一系列著作,不难发现,其中意义最重大、内容最精彩的,无不作于社会及文化的历史发生剧烈转折之际。

产生在周汉间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述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分别自儒、道、法等家观点,回顾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为后人描绘了这一“枢纽时期”的绚丽画卷。

① 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草创于南朝末,成书则应下及唐初。其《序录》对汉代以来占主要地位的经学,以及《老》、《庄》注释,作了条分缕析的叙述,“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其体例为后来类似作品所遵循。

理学风气兴于宋代,历元至明,发达到了极点。明清之际,学者遭遇了被形容为“天崩地解”的变故,不得不对学风痛加反省。此时出现的黄宗羲《明儒学案》,和黄宗羲至全祖望多人纂成《宋元学案》,无论从内涵之丰富,还是识见之精卓来看,都堪称传统的学术史作品的顶峰。

更大的历史与文化的变革,如所周知,发生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即应此时运而问世。梁氏的两本专书虽出于20世纪20年代,但他在1902年已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发表^①,成为他这方面研究的先声。

自1902年到现在,差不多又是一百年了。在新的世纪之交的当口,中国以及世界正在经历更深刻、更重大的变迁。面对新的挑战,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有再次回顾和反省的必要。我想,这便是近几年学术史工作,包括材料的整理、个案的讨论、分科的总结、整体的鸟瞰,一下子都成为热门的原因。

当前要做的学术史研究工作,以我的陋见,不妨归纳为两条:一条是重写学术史,另一条是续写或新写学术史。

历史作为已成既往的客观真实,是不能加以改变的,而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却因学者所凭借的材料、所依据的理论及方法,经常变易更新。如去年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先生指出的,目前重写学术史的条件已经是具备了。

就我个人长期投入的学科领域来说,近年田野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佚籍,其性质实在是令人深感震撼的。这大量的宝贵发现,使晚清以来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好多学术史观点,顿时不能成立了。过去被认为没有什么可供论述的,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

如孔孟之间的儒学、黄老一派的道家、数术与兵阴阳家等等，都有了足以凭信的材料。涉及先秦“枢纽时期”的学术史问题，很自然地又影响到对秦汉以下各代学术流变的看法。关系着历朝学者争论不息的若干疑难，像汉学、宋学的问题，今文学、古文学的问题等等，都有了重加考虑的必要。当然，这只不过是表明学术史应该重写而举的一个例子。

相对于古代学术史来说，近现代学术史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不管是汉宋学问题、今古文问题，还是什么，与当前学术的关系均已淡远，即使是梁启超著作中畅论的种种，和今天也有距离。与今天的学术存在直接联系的，乃是近百年的学术史，这便不是重写，而是续写或者说新写学术史的问题了。

研究历史的人都能理解，讲现代的学术史重要，不等于现代以前的学术史不重要。历史研究的价值，正建立在历史本身的连续绵延之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由上古至今传统未曾断绝，研究近现代学术仍不能离开对整个学术演变递嬗的概观。

我们这部十一卷本的《中国学术史》，就是重写中国学术整个变迁的一次尝试。

撰写的准备和设计，始于1993年。有关中国学术史的一些想法，得到多位专攻学术史的年轻学者的支持，也幸获江西教育出版社各位先生的许可，这样“中国学术史”即作为工作课题而成立了。应该感谢参加本书撰述的诸位，他们在各自岗位的繁重事务中尽可能集中时间，确实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老实说，当着手组织这部《中国学术史》时，我心中颇有些忐忑。我一直认为学术史应当做为一项艰辛的研究，不可限于史实材料及已有观点的臚列。用在中国科学院朋友中流行的话来说，是不赞成“以编代研”。不过，中国学术史范围辽阔，想全面论述又绝非短短几年所能完成。为此，我建议《中国学术史》采用勾画轮廓、选择重点的方式，以叙说各

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大势为主,这部书便是依此而著成的。

中国人一贯主张治史的目的在于鉴今,司马光的著作《资治通鉴》,突出地代表了这个看法。窃以为不能以这一点要求所有历史研究,有的研究的动机恐怕还只是求知。但是,学术史的研究确是有这样的效用的。重写和续写学术史,将有益于新世纪中国学术的创新。假如这部不够成熟的书能于此有一些贡献,我们便十分满足了。

李学勤

2000年8月11日于清华园

目 录

总序	1
引子 宋元学术概论	1
第一章	29
欧阳修对宋代史学的开拓意义	
第一节 宋学的开创者	29
第二节 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40
第三节 《集古录跋尾》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	48
第二章	54
周敦颐及其濂学	
第一节 《太极图说》的渊源	55
第二节 《太极图说》与理学开创	63
第三节 《通书》的学术思想	76
第三章	87
张载及其关学	
第一节 关学源流	88
第二节 “太虚即气”的天道论	93
第三节 心、性、诚、礼的人道论	100
第四节 《西铭》的天人一体论	109

第四章 114

二程及其洛学

第一节 天理论	115
---------	-----

第二节 人性论	120
---------	-----

第三节 修身功夫论	125
-----------	-----

第五章 132

苏氏父子及其蜀学

第一节 苏氏蜀学的学派特征	132
---------------	-----

第二节 苏氏蜀学对佛、道的吸取	145
-----------------	-----

第三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154
----------------	-----

第六章 164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学派

第一节 荆公新学之目的	164
-------------	-----

第二节 新学学派的治学特色	175
---------------	-----

第三节 新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地位	188
------------------	-----

第七章 197

道家与道学的结合点——北宋学者的《易》学

第一节 从道家、道教到道学	197
---------------	-----

第二节 北宋《易》学中的义理派	207
-----------------	-----

第三节 北宋《易》学中的象数派	219
-----------------	-----

第八章 229

司马光与《通鉴》学

第一节 《资治通鉴》的编纂体例和史学价值	230
----------------------	-----

第二节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245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通鉴》学	262
第九章	289
郑樵与《通志》	
第一节 郑樵的史学思想	291
第二节 《通志·略》的编纂体例和学术成就	301
第十章	312
沈括与《梦溪笔谈》	
第一节 沈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	313
第二节 《梦溪笔谈》的科学意义	320
第三节 沈括学术思想的渊源与特色	331
第十一章	348
胡宏、张栻及其湖湘学派	
第一节 湖湘学源流及学派特色	348
第二节 胡宏的理学思想	358
第三节 张栻的理学思想	370
第十二章	384
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	
第一节 吕祖谦的生平与著述	384
第二节 吕祖谦的婺学特征	389
第三节 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	401
第十三章	414
理学的集大成——朱熹及其闽学	
第一节 朱熹的理学	415
第二节 朱熹的经学	431

引子 宋元学术概论

两宋是中国学术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王国维认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① 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 宋元的诸多学术领域，包括经学、理学、史学、科技、佛道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本章首先论述宋代学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概述宋元学术发展的各个方面及其主要特征。

第一节 两宋学术演进的社会背景

自唐中叶至宋初，中国学术史开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那些历来以承担知识的创造和传承为使命的儒家士大夫再次成为这场学术思潮的主要力量，他们从传统经学的领域内，创造出了影响此后一千多年的新兴学术思潮，同时也推动着其他学术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和发展。当然，这一新兴学术思潮的兴起，不仅仅有着学术史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史的原因。

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思想意识有了新的要求，进而影响到了与社会意识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导致了学术史的一场重大变革。

①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64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首先,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方面正在发生重要演变。魏晋南北朝以来所形成的士族豪门地主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的大量涌现。这样,原来那种由士族门阀对荫庇制下的部曲、佃客进行直接人身控制的剥削方式被废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方式。这种通过契约和高利贷来剥削农民的方式,使得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弱。应该说,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宋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重要的发展。如农业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有了新的改善,手工业、科学技术也有了突出的发展,皆是明显的证明。

但是,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又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租佃制固然能使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减弱,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废弃了均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加速了地主的土地兼并。北宋仁宗时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已成俗”^①。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得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加剧了。

宋代经济还有一个重大演变发展,就是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宋代的矿业、冶金、陶瓷、印刷等行业均取得空前的发展,生产技术大大改进,生产规模也很庞大。在那些大工场中,大量雇用着专业化的劳动力。与此相关,宋代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货币发行数量激增,不仅发行了铜币、铁币、铅币,同时正式发行了纸币(称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宋代货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结果。由于货币的发展,相应也促进了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所以,宋代国家的财源主要依赖于商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已与农业税收持平甚至超过农业税。与工商业发达繁荣密切相关的是城市市民阶层的

^① 《宋史·食货志》。

兴起,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方面的特点。

其次,从政治方面看。赵宋王朝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化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宋朝统治者在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之后,吸取了以往因藩镇割据而导致政治动乱的经验教训,采取所谓“强干弱枝”的政策,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宋初开国太祖赵匡胤陆续解除节度使的兵权,以文臣代替武将,并将全国精兵收编为禁军,禁军的调动、作战,都受到皇帝的直接控制,以加强皇帝对军权的控制,防止将领因拥有军权而兵变的可能性。在官制方面,赵宋王朝还将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皇帝除直接统属政事、军务、财政三大系统之外,另设御史台司监察,以控制科举取士权。此外,宋王朝还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州县的控制,各州直接隶属中央,由皇帝主持委派地主官吏,实行任期制,并另设通判以与知州互相牵制。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对避免因封建割据而带来的战乱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宋朝统治者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弊端。首先,他们为防止兵变而将军事权力集中于帝王一身,禁军常处于“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状态,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宋朝在和边邻的辽、西夏的战争中屡屡失败,与此不无密切的关系。其次,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致使官僚队伍大大扩展,但许多官员往往是有官无职,致使冗员增加。这种官僚机构行政效率极低,尤其是给国家带来了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宋朝政府陷入经济的困境。其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还带来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性格、品行的优劣,和整个国家的治乱息息相关。一个任性、暴虐的专制君主,更加容易给国家、人民带来无穷的灾祸,危及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宋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均对社会伦常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宗法型国家,儒家文化在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唐宋时期经济、政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而增强了对儒家伦理道德调节功能的要求。

宋元学术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倡导复兴儒学,重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把儒家伦理建立在关于终极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皆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儒家伦理的道德调节功能,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理学家们热心倡导的纲常伦理、存理灭欲、义利之辨等等,往往具有双重的道德调节作用。首先,它要求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农民能够自觉地遵守封建秩序,成为不犯上作乱的顺民。其次,它也要求具有经济实力、政治势力的地主阶级从长远利益出发,自觉遏制自己贪婪的欲望,不要无限度地掠夺、压榨农民。这一切,皆需要强化道德的调节功能。理学倡导复兴儒学、重振儒家伦理,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要求。

理学思潮在北宋时期兴起,同样也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步强化的政治要求。理学家们复兴先秦儒学,重振儒家纲常伦理,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理学在政治方面也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具有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儒家历来重视君臣父子的纲常秩序,理学以复兴儒家伦理为核心,将这种纲常秩序上升为“天理”,肯定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要求人民自觉服从这种统治,有益于专制集权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儒家伦理对政治权力加以制约和调节的功能。儒家伦理所以标榜“仁政”、“德治”,完全是为了实现用道德制约、调节政治权力的目的,使这种专制权力能纳入正常的政治秩序之中,不要在无限的膨胀中毁灭自己。理学家们对帝王们大谈“格君心之非”、“存理灭欲”,企图将这种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纳入“天理”的支配之下,正是为了用儒家伦理制约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实

现用伦理调节政治的功能。由此可见,理学思潮在北宋兴起,与当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集中的政治背景有关。

古代中国任何一场学术史的变革和发展,均与社会史的变革发展密切相关,儒家士大夫们很难完全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从事学术活动。正如龚自珍所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① 当社会处在变革、发展时期,敏感的儒家士大夫即开始思考新的学术变革。宋代学术高潮的兴起,正是这种社会变革的时代要求。

第二节 宋元学术的文化背景

宋元学术的兴盛,还与整个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如果不了解宋元学术兴起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宋元学术崛起的文化原因、学术特征和学术成就。

宋元学术的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 复兴儒学

在先秦,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本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自汉武帝采纳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不仅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儒家思想的学术形态——经学,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所以,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研究几乎吸引了所有的学者、读书人,经学成了当时学术界惟一受到普遍重视的学问。然而,儒家经学独霸天下的局面并没有能维持很久,魏晋、隋唐之时,以道家学术思想为基础的玄学、中国本土的道教与从印度传人的佛学等相继兴起,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佛道之学演化为一股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新兴学术思潮,这时,儒家经学的地位

^① 《龚自珍全集·治学》。

受到了动摇。

然而,儒学不仅是一种以知识的研究、积累为目的的学术,更是一种规定国家体制、政治运行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所以,儒家经学的衰落远远超出其学术史的意义,而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和稳定。这时,社会感到有对儒家学说的强烈的需求,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开始呼吁、倡导复兴儒学。唐中叶兴起的古文运动,应看做是这场复兴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始。

韩愈(768—824)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时期复兴儒学文化思潮的倡导者,故也是宋代学术之兴的肇启者。钱穆认为:“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①韩愈所以要求复兴儒学,根本宗旨在价值体系的“道”。他的古文运动是以“文以载道”为宗旨,他还著有《原道》,可以说是他这一主张的思想纲领。他认为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说: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②

韩愈一方面强调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从尧舜传之孔孟的一以贯之的“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的千多年此道统已经断绝。这样,他就否定了两汉经学在传承孔孟道统方面的意义和地位,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将要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的文化使命。韩愈的“道统论”和“文以载道”论,表达了唐宋之际复兴儒学的时代要求,对宋代学术思潮的勃兴产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② 《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